

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

内部稿 1—6 合订本

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编印

1984·7·济南

编 者 按

印《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内部稿，比“正本”快当、简便。文稿来到，三几万字或七、八万字，就可以印一本，不定期出版，供各地党史工作者、一些老同志早见到，早利用。厚本薄本，多印少印，不必拘一。再就是重史不重文，只要是史料，文字可以粗一点。至于史料的查核、订正，文词的推敲、润色，回头继续办好。——这样印出去，在一定范围内征询意见，进行补充，订正偏颇，受到启发；请老同志们多写，我们一本本编印，日积月累，量、质互见，使“内部稿”办好。

(1984年2月10日)

沙 区 浩 劫

——一九四一年日寇于四月十二日“扫荡”冀鲁豫边区后的情况调查

说明：这是一九四一年日寇大“扫荡”之后，根据冀鲁豫边区善后工作队，经过深入调查所作的汇报，整理的一个材料。于去年秋天找出，此次来济南前，略加增删改写而成，仅供进一步搜集资料和研究冀鲁豫边区革命斗争历史的参考。

夏川 1984年3月

一

冀鲁豫边区地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最初辖有：河北省南部之濮阳、清丰、南乐、东明、长垣及新划县尚和；山东省西南部之曹县、菏泽、定陶、考城、兰封，及新划县齐滨；河南东北部之内黄滑县、浚县、汤阴、淇县，及新划县高陵、顿邱、卫河等县。该区是山西和山东、华北和华中联系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唯其如此，就成了敌我必争之地，敌、伪、顽、匪、会道门均极活跃，情况非常复杂。

一九三九年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领部分主力部队进入冀鲁豫地区，并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广泛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伪、顽、匪及各种汉奸地主武装，开展群众工作，逐步打开了局面，创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一九四〇年四月，正式成立冀鲁豫区党委冀鲁豫军区，解决了统一领导问题。一九四一年一月，又在广大群众的热诚拥护下，成立了冀鲁豫区行署，不仅进一步解决了全区的组织领导问题，各项工作也有了明显的开展。

这一切，对妄图灭我中华，亡我祖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无疑是一严重威胁，因之就想乘我工作基础尚未稳固时，一举摧毁这一望之生畏，思之心惊的抗日堡垒，而又把主要矛头指向濮阳以西，内黄以南，滑县以北、卫河以东，方圆五十里左右的沙窝中心区。

敌人的“扫荡”，从四月十二日开始，起初是试探性进攻，十四日分五路进行合击。除强迫会道门、土匪配合外，共有日、伪军各五千多人。其中骑兵一千二百余，大炮二十多门。坦克一百一十多辆，飞机两架。十五日寻求与我主力作战，以求消灭我边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十六、十七两天，去沙区进行纵横搜索；每路敌人又分若干路，各带大车多至百余辆，少亦数十辆。到处撒毒药、砍枣林，大肆烧、杀、掠夺，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二

在“扫荡”中，敌人充分使用了让中国人民自相残害的毒辣手段。第一个卖力，打冲锋的是伪军头子李英，他是敌人的先遣司令官。十一日，便亲率伪军南犯茨藩，虽然

遭到我军痛击，又退回东庄集，却把我军的虚实刺探得一清二楚。十四日晚，再度配合清丰之敌，进到南张堡，另派一部伪军于同日进到大堤口，崔张固，做敌人的向导部队。河西伪军司令华生、韩老俊，在五陵集之敌十四日“扫荡”沙区时，跟着过了卫河，进到大、小槐林一带，以配合敌人行动。安化城之伪中央二十四路，于十三日进到井店以西之杨文城，积极配合敌人“扫荡”沙区。盘踞尚和县之国民党叛军，在四月十七日北进古云集，和敌人遥相呼应。汉奸孙步月，同样跟在敌人后面，自康李村东进，和白道口会门配合，强迫薛村等村群众成立会门欢迎敌人。濮阳县的会门也以许村集、顺河集、王寺为基点，到处鼓动群众设坛，插旗子。还有一部分土匪、地痞在阎垌、桑村、路州一带，企图组织伪中央军、暗杀队，为敌人效劳。

敌人还通过伪军、汉奸、会道门散布谣言，欺骗群众，破坏共产党、八路军在人民中的威信，制造恐怖气氛。李英在保长会上痛哭流涕地欺骗大家说：“我也是中国人，实在不忍看自己的同胞这样让鬼子屠杀，这都怨八路军！他们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我一出门他们就打，闹得连门都不敢出，八路军这不是骗人吗？！”故意曲解我军的战术原则，说“八路军是‘吃干队’，日本一来就跑！”并利用群众自私自利的物欲观念，哄骗卫河以西的群众，带大车到河东抢东西，发洋财，以造成河东、河西群众的严重对立。

三

敌人六天来的疯狂“扫荡”，其残暴狠毒无所不用其极，使我沙窝中心区，遭到空前的浩劫，仅内黄、高陵、顿邱、卫河四县，被害村庄即达一百四十一个。

内黄县有：南张堡、东张堡、西张堡、大堤口、余庄、马张垌、崔张垌、王张垌、阎垌、土镇、桑村、丁村、东、西路州、赵庄、李后、七丈垌、夹河、城堡、马集、岳茨藩、马茨藩、破车口、千口、袁鲁村、温邢垌、化村、王尉、河道等八十三村。

高陵县有：邵村、薛村、齐村、东西留固、李垌、郭桑村、杨桑村、河东、李庄、李盘邱、孙小寨、辛寨、小吴、二杨庄、双村、堤上等四十村。

顿邱省有：胡坟、张咀、四阴、班家、东西王寺、前后坟台头、柳门、小豆村、后孔村、新庄等十五村。

卫河县有：大小王旦、张公村。

就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地区，敌人以万余兵力实行大烧、大杀、大抢的“三光”政策，而这“三光”政策的实施，又以薛村、南张堡、阎垌为重点。因此，薛村、南张堡、阎垌三村及附近的土镇、千口等村损失最重。不完全统计：薛村死一百八十人，烧毁房屋九百三十一间，烧毁粮食三百四十七担，被杀及抢走牲口三十七头。阎垌死一百七十五人，失踪一百九十二人，烧毁房屋七百八十七间，牲口被杀二百八头。南张堡死一百一十人，死七人，烧毁房屋一千四百三十二间，烧毁粮食二百余担，损失牲口二十六头。土镇死二百九十六人，失踪四十一人，烧毁房屋九百七十三间，全村粮食大部烧光。千口死一百一十六人，伤九人，烧毁房屋一千三百五十间，烧毁粮食二百九十六担，损失牲口四十二头。

敌人的大烧、大杀、大抢，自十六日开始，一直延续到十八日。仅只三天，全沙区群众被杀害即达两千三百零七名，失踪二百六十三名，伤一百八十六名，使沙区出现了五十三家绝户，创造了最野蛮、最无人性的纪录。

在阎垆，敌人把桑村、城堡和在沙窝搜捕到的群众，以及土镇受坏人诱骗欢迎敌人的部分所谓“良民”，全都集中在这里。起初，说是“讲道”，后来，除一部分拉到村东道沟活埋外，大部分给填进了阎垆的七口水井。开始是往井里推，用刺刀捅，以后在水井即将填满时，还要压上石滚，浇开水，用炸弹炸，最后拥土把井口封住，有一口井还撒上了毒药。

在南张堡，敌人把二十多个老百姓塞进一间屋子，然后点起烈火，把他们都活活烧死在里边。被围在村里的一个卖豆腐的小贩，不仅被挖了眼睛，割了耳朵，还把五脏六腑扒出来乱丢在街上。

敌人把城堡躲在沙窝里的老百姓都用绳子捆起来，有的扔进水坑里用炸弹炸死；二十多个青年妇女给扒光了衣服，用各种办法进行污辱，最后是一阵机枪扫射，被统统打死。

敌骑兵到夹河时，六十多个要逃还没有逃出村的男女老少，都在敌人的屠刀下断送了性命，安三的老母亲竟被砍成了八块。

土镇有三个小孩被投进了烈火，敌人却在一旁哈哈大笑。余庄有七个老百姓被套在大车上，敌人象驱赶牛马一样寻欢作乐。东张堡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被敌人活剥了皮，挂在村东水坑边的大树上。在桑村，一个婴儿被撕成了两半。……。

经过火烧、大杀、大抢，沙区到处是一片悲惨杂乱景象。内黄县烧毁房屋二万一千一百五十九间，被抢走和烧毁粮食六万六千二百二十八担；高陵县烧毁房屋二千八百四十四间，抢走，烧毁粮食六万六千一百六十八担。王张垆是仅有三十八户的小村，除一家幸免于难，其余三十七家全被烧光。土镇全村有九百八十七间房屋，烧毁九百七十三间。城堡则一间不剩，连鸡窝、猪圈都烧得净光。

敌人想法要灭绝我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仅内黄一县被屠宰和抢走的大小牲畜，即达四百四十六头；大车被烧毁一百九十五辆；粮种全被烧尽，使沙窝的农业生产条件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敌人深知花生、枣是沙区的两大特产，沙区人民是依靠这两种特产来活跃经济生活的。因而，在烧毁全部花生种子的同时，还有计划地毁坏枣林。敌人“扫荡”时带来很多钢锯，逼迫随同他们前来沙区的河西群众砍伐枣林。敌人还把砍伐枣林看做是一种劳役，被抓住的老百姓，很多是被强迫锯了几天枣林之后再打死的。可惜全沙区枣林的损失没有详细统计，只知道千口被砍林三千三百四十九棵；破车口的枣林全被砍光；城堡东街十七户中，被砍枣林即达四十六亩；从丁村住西直到桑村，绵延十数里，各村枣林残留无几；桑村枣林，损失在十分之八以上。锯倒的枣林，大部被敌人用汽车拉走了，剩下的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使遭劫后的沙区更显得格外凄凉！

四

在敌人“扫荡”沙区的几天里，有兽性的烧杀和狡黠的欺哄；也有冲天的仇恨和无

畏的斗争！四月十二日，敌人的试探性进攻刚刚开始，就让我主力部队打了一个下马威。在茨藩、岳庄、庆相、杨文城、井店等村，与地方部队相配合，前后进行了十几次战斗，毙伤敌伪五百余，日寇军官清源亦被击毙，俘敌伪五十余名，毁敌汽车三辆，缴获步枪五十余支，战马五匹。同时，我鲁西南部队积极配合沙区反“扫荡”作战，将当地伪军胡老头部全部消灭，生俘六百多名，缴获步枪三百多支，短枪四十余支、机枪四挺，自行车十三辆，马二十余匹，子弹四千多发。配合敌人北犯的国民党叛军，亦被阻击于古云集，并给于极大杀伤，死伤逃散千人以上。

正规部队运用灵活的战术，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在跟敌人顽强巧妙的周旋中，创造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杨文城战斗时，军区独立团六连副连长何尚同志和六个战士，与部队失掉了联系，走到哪里哪里都是敌人的嚎叫声，但他们并没因此而丝毫畏惧，却坦然沉着地应付着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们从不消极地保存自己，始终抱着“誓共生死”的决心，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在破车口，他们出其不意地给了敌人以突然杀伤，而敌人的枪弹再密集，也找不到七勇士的去向。一次，他们和敌人满载衣物、资财的十余辆汽车遭遇，他们以迅猛地动作，一下打坏敌人的两辆汽车，当敌人大队赶来时，我们的七勇士早已跳到包围圈外去了。后来，薛村模范班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十九日，敌人反复“扫荡”薛村附近的村庄时，他们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打死了七个鬼子、一匹洋马。在敌人疯狂“扫荡”过程中，他们始终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不只是薛村的模范班在反“扫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南张堡的模范班和自卫队也表现得无比英勇。当李英的二百多皇协军即将到达南张堡的时候，三十多个模范班、自卫队员在葛贵香领导下，有计划地在寨外，寨墙上布置好，一阵排枪把大模大样的皇协军打得晕头转向，一下伤亡四十多。皇协军溃退了，寨里寨外的老百姓便乘机逃了出去。他们一直坚持到敌人的汽车部队来到才撤退。自卫队副队长和一个队员，在掩护群众撤退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如西张堡、大堤口、邵村、齐村、刘邢堙、太平等村的模范班、自卫队，也同样拿起了武器，运用麻雀战术与残暴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最令人感动、最难能可贵的是两个抗日保长的事迹。一个是 大堤口的副保长，当敌人快要来到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家，不是自己的亲人，而是驻在崔张堙的边区行署。他不顾一切地急忙跑出去给行署报信，结果行署转移了，没有受到一点损失，但在他跑回家时，父、母、儿子、外甥却都惨死在敌人的枪刀之下；他的女人也受了重伤，而他却没有丝毫的怨言。余庄的老保长已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但他人老不服老，对抗日工作仍然非常热心。敌人“扫荡”余庄之前，他不顾一切地发动群众，秘密挖了一个相当安全的地洞，把八路军的重伤员隐蔽在里边，不管情况多么严重，他却能想办法去看望他们，还冒着生命危险，到东西路州给伤员找吃的。敌人撤退后，余庄死了许多老百姓，一些幸存者也都在天天闹饥荒，而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保长，却从没有缺过几位不能走动的重伤员的吃喝。

五

敌人“扫荡”过后的沙窝中心区，从顺河集往西，很少看见人影，也再听不见鸡鸣犬吠，到处可见横陈的尸体，各村的房舍大都是一片灰烬，在瓦砾堆里，也只剩下些破碗、烘缸和仍然在冒烟的焦粮。小股敌、伪、会、匪仍不断骚扰，使陆续返回家园的人们一夕数惊，恐慌万状，汉奸、敌探更是乘机造谣破坏，再加上对“扫荡”的恐惧心理，在群众中滋长了一些悲观失望情绪，有的甚至还埋怨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因此，边区党、政、军、民各界，为了迅速恢复和健全区、村政权，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镇压汉奸活动，制止会门的发展；稳定社会秩序，解决群众当前困难；号召沙区人民团结一致，和敌、伪、叛、匪进行坚决斗争，保卫和巩固边区抗日根据地，及时组织和普遍进行了同思想教育密切结合的善后工作。

开始，是在党、政、军、民所共同建立的善后工作委员会确定的方针指导之下，从区党委、行署、军区，第一、二地委，专署，一、二军分区，救国总会、共调干部一百二十多人，组成五个善后工作队，到灾区各地进行慰问，宣传、调查和救济工作，并配合各地恢复和健全各种组织。

应该说，当时的环境确实非常复杂，非常困难，但敌人的暴行激起了工作队全体同志的高度仇恨，使他们在半个月之内，走遍了一百二十五个村庄，他们用召开群众大会、干部会、个别慰问等方式，进行了普遍慰问和灾情调查，还帮助各级政府进行了急赈工作，总计在七十五个急赈村内，共救济了一千四百一十个急赈户。同时，边区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以及全区抗日人民，省吃俭用所捐助的粮食、种子、农具、衣服、锅碗、席棚，为数也相当可观，并将行署一万元拨款，两万元无息贷款，及各界人民所捐助的六万多元如数赈济了灾区，解决了灾区人民一定的困难。尤其是经过对敌伪、叛匪的坚决打击、镇压和耐心细致地宣传、教育、解释工作，部分群众的悲观失望，恐慌埋怨情绪，有了很大好转，使浩劫后的沙窝中心区又开始复苏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

从延安到湖西地区

张 自 强

（编者按：四川省第二轻工业局副局长张自强（原名张天喜）同志，一九一七年生，陕西省西安市人，一九三七年入党，同年参加革命。）

我在西安市第二中学读书时，曾经参加过西安学生的一些活动。比如象“七君子”被捕后的援救活动。以后的纪念鲁迅等活动。

一九三六年西安“一二·九”运动前，参加了一些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后又参加了西安学生为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的“一二·九”运动。在十二月九日早晨天未明的时候，学生们（先是中学生，后来小学四年级学生也参加了）集合起来去请愿。先到教育厅请愿，教育厅长没出来接见，转而又到新城绥靖公署找杨虎诚。杨虎诚也没接见。他的秘书长出来接见了学生，对请愿的学生说，你们大家的意见很好。要求抗日，一致对外，参加抗日，他讲完以后，我们立即又到省政府去了。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到是出来了，他讲，爱国嘛，抗日嘛，救亡运动很好，我把大家的意见转给蒋委员长。从省政府出来以后，又到南院门剿总找张学良，张没出来接见。大家一致要求见蒋介石，蒋介石在临潼，到临潼去请愿。这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向临潼出发。这天早晨起来到下午都没有吃饭。开始要到火车站去坐火车，但城门（中政门）已锁，砸开锁出门后到火车站又没人开车，于是只好步行，从火车站往东走到了十里铺附近，在离十里铺不到五华里的地方是五里墩。到五里墩时，太阳快落坡了，这时后边在喊：站住！站住！张副司令（即张学良）来了。听说张副司令来了，我们就停下来。在马路南边有个土台，张副司令就站在土台上讲，你们不要往前走了，往前走没好处，大家的意见很好，很对。我是东北人，我们部队也要求打回老家去。大家先回去，我把大家的意见转给蒋委员长。我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们跑南跑北，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家属也都提出要打回老家去。这时候，我们就唱歌。唱“打回老家去”，《在松花江上》，我们学校学生站的位置离他很近，他在上面讲，我就在他的下面听。张副司令最后讲，大家的意见，七天以内给大家答复，要大家先回去。这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了，走不动的女生和身体不好的男生就坐张、杨部队派来接学生的汽车回校。我们身体好的男学生步行回校。回到学校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过了两天（11号，晚上，学生自习之后照习惯到街上买点东西吃（如烧饼、馒头等），但这几天不知何故，都没有买到，只好回校睡觉。第二天（12月12日）早上听见枪响，八点多钟又看到东北军，西北军坐汽车宣传，张、杨两将军向蒋委员长进行兵谏。此时才知道蒋介石被扣。十天后，张学良送蒋介石走时，我们还在外搞宣传活动，回来才知道张学良送蒋介石一起走了。大家有点不满意。

这时，中央红军已到渭河以北，党中央在云阳办青训班。三七年元旦之后，我们到了云阳青训班（哪个月忘了），我和聂井德等几个人同去青训班学习，回来做工作。到了青训

班时，这一期结束了，不办了，正要往安员堡搬。到云阳后，办事处动员我们先回西安，说还是回去好做群众工作。因为青训班要搬家，所以我们就回来了。回西安没多久，四月份由刘永端同志发展我为共产党员。入党后，开始在西安二中和刘永端、魏恭宪三人为一个组过组织生活。后不久由特派员王俊直接领导，单线接头。规定不在接头时间不能相问。由上次接头定下次接头的时间和地点。其内容主要是谈学校情况。其实王俊同志是经常到学校去的，但不在接头时间不准相认，这是党的组织纪律。直到“七·七”事变后，十一月、十二月份由省委以民先的名义派我到邵阳驻军177师工作。我们一共去了八个人，是以民先队的名义，而不是以党的名义。去后，具体领导我们的同志谈，军队要在沿黄河七县发动群众，我们在177师由师秘书长领导，每人都是上士军衔，确定先进行三个月的军训。毕业后担任民运指导员。在177师司令部秘书长直接领导下，民运指导员主要是到各联保去作社训队的训练工作。我被派到邵阳县洽川联堡组织训练青壮年队。社训队就是社会青壮年训练队（我们叫自卫队，国民党叫社训队），其任务是对青壮年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在三八年四月的台儿庄大会战时，我们师长李兴中请战：东渡黄河参加战斗，司令部刚渡黄河连渡口还没上去，就被敌人包围了，打了一天多，没过去就回来了，师长李兴中先回来，我们也回来了，到黄河滩上，待了几个小时后，河防部队不准回去，但河滩又不能站，因为一站就往下陷。后经交涉，同意我们上岸。我们回到邵阳后，七县特委决定我们当夜离开部队回西安，然后到延安去，一切公开手续都已办好了，我们在邵阳未停，就出发步行一天一夜，到华县上了火车。火车坐的满满的，我们几个只好坐在火车的保险杠上，因为我们穿着军装，当兵的没人挡，就一直坐到西安。

七月份，由省委给我，姜永亮和李长安三个人改了名字。后于七月二十一号从西安出发，背着东西过渭河到三原，国民党在渭河岸上设有卡子，专卡我们这些人。我们就从小渡口顺利地过了河。终于在七月二十七、八号到了延安，住进了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没住几天，“八一”就到了，庆“八一”每人发一筒牛肉罐头（这是战利品）。过了“八一”，组织部介绍我们到陕北公校分校（栒邑县），陕北公学分校是新建的，我们去时因一、二区队人都满了，三区队是女生，故又新建了四区队，我们所在的四区队一队是39队，区队长是孙力余。协理员是方波、刘惠东。这个队多是广东、广西一带的学生。去的时候戴着大沿帽，穿着大皮鞋，提着大皮箱。一个队一百六、七十号人，没房子住，就自己挖窑洞。继39队之后，又新建了几个队，由于当时干部很缺，我只学习了一周就出来工作了，调我做后勤工作，任总务科助理员（政治干事）。除39队住房子外，其它后来新建的8个（40至47）队都住自己挖的窑洞。47队是8、9月份开学的。11月份组建抗大一分校。由陕北公学分校的四区队和抗大的五大队合并组建而成，抗大一分校的校长是何长工，副校长是周纯全，黄欧东是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任训练部长。分校于12月底东渡黄河进入敌后，一月份到晋东南屯留县故县村。我在政工班学习三个月就分配了。先到二支队政治处组织股当干事（股长是严政），后分配到一支队二营七队任副指导员（支部书记），队长叫何漫，指导员任鸿泽，他是安徽大学生，38年参加革命的。一支队准备在七月七日毕业这一天举行全校阅兵。经过二、三个月的准备，啥都准备好了。还要改善生活，啥都成熟了，只等到七·七开会，阅兵了。可是，在七

月六日晚上八时，校部突然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通知说敌人围攻开始了，离我们很近，敌人骑兵已到夏店，距我们只有五十华里（我们在古章），要我们在当夜12点前离开古章。动员会后就打背包，能带的东西就带走。11点出发，12点进入陵川大山里边打游击，二支队的毕业学员，组成山东营、总部（总司令部）命令分校全部东进山东。十二月，全校也奉命东进，叫东进支队。由陵川往辽县行进，准备过平汉路，一路上，天下着大雪，气候很冷。我们区队长的脚都冻坏了（因他有病骑着毛驴走）。东进支队的负责人就是周纯全和韦国清，何长工没去。开始动员叫韦国清带去，何长工校长、周纯全副校长不能走，何长工说，我是个跛子不能去，不能跟你们跑那么远的路。周纯全的一只眼睛不好也不能带你们去，韦国清部长带大家到山东去。周纯全、何长工在抗大的威信很高，印象很好，换人去，能不能带到山东。因到山东要过几条封锁线，下了太行山还要过平汉、津浦铁路，群众的意见反映到了总司令部，总部才决定周、韦同去，大家才放心。一路上很艰苦，行军每个人一支步枪，20排子弹，四个手榴弹。国民党不让我们到山东去，我们总部假说给山东部队送子弹，国民党封锁，缺少弹药。到了鲁西住了两天，过东平湖。过津浦路是从大汶河桥洞子下面钻过去的。记得那天晚上很冷，（这时正是39年12月31日晚上，第二天就是40年元旦）。我们在津浦铁路桥的桥洞里等了很长时间（这时正是深夜12点左右）。因为桥南、北两头的日本鬼子在桥上面贺新年，要等他们拜完年之后我们再走，原计划那天行军140里路程，过了铁路再走20里就到目的地了。可是，因被敌人发现，敌人追来了，边沿区又不能休息，要再走20里，到比较安全的地区才能休息，可再走这20里路很困难，政治工作也很难做，走了六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又继续前进，到了沂蒙根据地。当时，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住在那里。几天后就是春节，春节开了庆祝会，徐向前司令员、朱瑞政委讲了话。过了春节后，山东分局向部队要干部，要从抗大抽一批干部到地方去工作。我们这些副指导员被抽出留下来了，有的到分局，有的到地区党委。我和楚建民、陈健吾（现在贵州）、林洲四人到山东分局。山东分局给我们谈话的是潘复生同志（他当时是组织科长）。叫我们四人到湖西，湖西是山东分局五区党委。到湖西又要过一次津浦路，如何过法，我们先到了115师师部。我们四个人在堡斗谷山区的代炉镇等了几天，这期间正好是才消灭了汉奸孙鹤岑。我们又去参观了战场，五、六天后，湖西有个独立营，营长是旅云海，由他们护送我们从山东到湖西过津浦路。我们过了津浦路又过微山湖，到湖西根据地的金乡县鲍楼村区党委住地报了到。这时，湖西根据地原因错误地搞了肃反，脱离了群众，把统一战线也破坏了。肃反后，过去那些和我们关系好的如丰县的黄体润、董玉珏、董雪山，单县的朱世勤等地方实力派，以及原国民党的一些在抗战初期和我们搞统一战线的人，都离开了我们。有的甚至武装反对我们，如原沛县国民党县长冯子固，丰县县长董玉珏，他们都有部队，叫丰县常备队，沛县常备队，肖县有贾学衍，还有耿歌聋子（耿云斋），还有个朱世勤后来都成了我们的敌人。单县有个时锡九，原和我们关系很好，开始建立政权时被选为我们的县长。未到任就慢慢离开了我们了，原因于一方面是我们政策上犯了错误（未建立政权、肃反错误）；另一方面是国民党把他们收买了，因而让原来的朋友成了敌人。因此，湖西根据地变质了，肃反前没建立政权，政权都在地方实力派手中，

这些地方实力派都是县长。肃反之后，他们反对我们，群众不信任我们，再组织发动群众困难很大，原来的农会垮了，青救会垮了，老百姓不信任了，我们原来的中心区也不安全了，原五区党委书记是白子明。我们去时（40年4月）肃反造成的后遗症很严重。40年下半年以后，潘复生到湖西工作，白子明调走了，潘任湖西地委书记（原山东分区五区党委改为地委划归冀鲁豫区党委），潘召开群众大会，代表中央宣读了毛主席给民主人士孟仰陶先生的信，承认肃反的错误，并为肃托中死难者平了反，追认为烈士。孟先生的儿子是个大学生、老党员，原任区党委组织部长，肃托时被杀害。这个老头子是民主人士，是进步的，对肃托不满，给毛主席去了信，以后毛主席回了信。潘复生来后，在单县召开了几万人的大会，凡是肃托有影响的几个县都派群众代表参加了大会。大约在12月前后，向大家宣布中央的“肃托”政策是错误的。这样，根据地的形势才慢慢好转。我是40年4月到湖西的，在湖西五区党委青委、青年联合会任组织科长。我四月到湖西时，还没有建政权，12月潘复生来了以后才开始建政权，先后建了政权的有鱼台县（县长是李贞乾）。单县（县长为搞统战是民主人士时锡九）。金乡县和丰县等县政权，接着建立了专员公署，李贞乾任专员。12月调我到鱼台县当了几天县委书记。到那里没有一个月，因为地方干部需培训，又调我回来办党校，在湖西地委党校当队长（支部书记）。指导员是王光中（副书记现在辽宁省）、朱煜如。党校对外称独立中队。党校一个月一期。42年初我离开党校到组织部重新分配工作。党校的工作由中央马列学校毕业的宋惠、李佐长接替。这时湖西很紧张，高树勋到湖西了，高在冀南和我搞统战。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叫他到湖西来占领这个地区，要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搞磨擦。后来他那支队伍就垮了，到5、6月份湖西调干部到巨南去，成立巨南工委。巨南原归二地委，后因敌人分割才划归湖西。巨南包括成武县、巨西县、嘉祥县、金西县、定陶县，巨南工委书记是颜朱林，组织部长是杨海鹏，宣传部长是王探丽，我在工委任组织科长兼秘书长。巨南那地方交通不方便，没有建政权。调了一批干部如成武县委书记卢成亮，金西县委书记黄天明，巨西县委书记王尊先（现在成都原是成都市卫生局副局长）等同志去巨南工作。巨南这个地方的部队原是21团，属教导第七旅。19、20、21团在那里活动。我们到这地方工作没多久，大约6、7月份就发生了红枪会暴动，是由打大烟引起的。我们宣传不准种大烟已几年了，但从未检查，每年农民都偷种偷收无人管，42年我们到巨南后，要求严格了，老百姓种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很好地检查。到了大烟开花（遍地开着红、黄、兰、白色的烟花），老百姓快要收大烟时，五县联办和巨南工委见此情况才准备采取打花的办法不让老百姓收大烟。于是，机关干部拿着杆子，县里的干部拿着杆子到地里去打烟花。大烟是老百姓赚钱的东西，一打大烟，老百姓就不满意了，快吃到嘴边地东西叫我们给打掉了。此时，国民党就利用我们这一工作方法上的错误来挑动群众反对我们，企图把我们赶出去，就这样发生了红枪会暴动。这个时候，我派21团去打敌人，敌人住在马庙，周围是水。我们部队去了以后，就把敌人包围了，但没有打好，敌人突围冲出来反而把我们赶得到处跑。敌人在几个县的地主武装、红枪会、国民党特务都来支援他们，把我们围到一个大庙里，围了整整一天一夜。这时就给湖西地委和军分区打电报，湖西才派十团来给我们解围，把敌人消灭了。这是42年夏天的事。从此之

后，巨南地区就慢慢地平静了，地方工作也搞起来了。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地区有一点基础，各县都有几个党员，这个地区原来七旅在那里，张国华的部队也在那里活动过。

四二年底，我由巨南工委调到巨西县委工作，王尊先是县委书记，我是副书记兼基干大队的政委，那时讲一元化领导。实际上这一段时间，我主要做县大队的工作。那个地区是个什么样的地区呢？巨西这个地区，我们去的时候，基础很薄弱。有一点基础，有五大村（李楼、葛集、马楼、徐堂、蒋海等），但只葛集有一个党员。营里集是敌占区，有几个党员。城北敌占区的官厂、白果树、小屯等村有几个党员。巨野一区域北有几个党员。那个支部书记叫张启义（解放后叫张华），是个打锡壶的。四三年我们派李秉田同志到城北成立了一个区委。区委书记就是李秉田，他是江苏沛县人。李在城北是秘密活动的，他公开身份是卖书的；挑着一个书挑子卖书，串学校发展党的组织。巨西县行政区包括章凤区、东平区、新表区、成武的汶上区，还有巨野的四区（在巨野的南边）。巨西是一个很贫苦的县，盐碱地占大部分，不产粮食，而且土地集中，人民生活很苦，觉悟也高，但土匪也多。我们开始从五水坑发动减租减息斗地主，组织农会，发展党员，逐步推广到黄塘、五大村，咱们部队在五大村有点基础，在柳林集这个地区这时未公开活动。去了之后，土匪带了驳壳枪，装在盒子里面，挂上红穗子、绿穗子、兰穗子，给我们一块串来串去，一块赶场。老百姓反映共产党和土匪是合作的，后来就采取穿便衣的办法，经常穿便衣。我去的时候是四二年的秋天。他们在高粱棵起来的时候活动。他们怎么集合呢？就是高粱棵起来之后，晚上打枪，他们有暗号，你在这边一听汪、汪、汪，到那边一听，汪、汪、汪。到第二天早上看，各人就回来了。白天回来，夜里就出去。马楼、李楼一带也有活动。光巨野就有八个土匪头子，每人都有几百人到千把人，白天在家，晚上出去架户。有几个很坏，如马体廉等，奸淫烧杀，什么坏事都干。原来巨南工委和五县联办（牛连文是联办主任）准备以开会的方式，把他一网打尽，但未成功。43年初，我先抓了冯玉法（土匪头子），这个人的罪恶不大，属中等。但他在被看管中企图逃跑，被我们抓住时他反而将看守员的指头咬掉了。这下他以为活不了喽，但县委研究决定，这个人不能杀。故在柳林集召开大会宣布教育释放，冯玉法当场跪下发誓，今后不干了，承任过去有罪恶。群众反应共产党看得准，谁的罪恶是大是小都清楚。那时候我们县长是王绍一（现在菏泽），他是巨野人，他很早就原巨北抗日杆子会的头头，也是前地主武装的头头。日本鬼子去了，和鬼子打过一仗，张国华同志一去，搞统战时发展王入了党。巨北的工作就以杆子上层人物为基础发展起来了。以后王绍一到巨西建立政权，他任县长。巨西为巨南根据地的一部分。县委是四二年成立的，我们去时，王水坑有个地主叫王光亮，开展减租减息时，发动群众斗王光亮，斗完之后找积极分子，发展党组织。第一批就发展了五个党员，他们中有王振声、王振伦、王振国等。还有外姓的。因为巨西这地区基本上没有党组织，还因为根据地开始也是在他们那里开始工作的。所以王水坑后来为此很骄傲，象王水坑、黄塘那里我们经常去。还有一个五大村，部队在那里，有个李楼，这个村当兵的有几个，其中有一个李长堤原是个土匪头头，后来把他争取过来了，并做了些工作，但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表现不好。巨西的区划中还有一个是成武的汶上区。在汶上区有个打国民党的牌子，地方实力派——区长姬长周，

他是本地定陶县人。他有一个团，经常抢老百姓的东西。我们县委、县政府、县大队经常到汶上区活动，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听群众的反映。正好这年闹大灾荒，粮食没有收成，老百姓吃不上饭，我们开始也吃不上饭，几天就只吃树叶。后我们可到外地要粮，当然也很困难，但总比汶上的老百姓好一点。我们节省着吃，把节余的一点粮送给当地老百姓，还要看到老百姓吃下去，不然姬长周的兵就抢走了。时间长了，老百姓认为我们是好人，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就跟我们接近了。姬长周这个区长跟我们不坏也不好，对他如何办呢？我们就派了一个干部王福庭（定陶人），利用关系到姬团作秘密工作，经过一年的工作，四五年姬长周率一团起义了，改编为巨野独立团，姬为团长，政委是丁润桥（县委书记），这时我在太行整风。当时汶上区委书记是史效义同志。后培养了一个当地干部准备当区委书记，这个人叫党元修，是党楼人，家里很穷，是跟他妈要饭长大的。那时二十多岁，我们去的时候，他当农会主席，工作很好。因从小受当地地富压迫欺侮，经教育后进步很快，在减租减息和土改中都表现得很好，后脱产在区上工作。四六年元旦，巨野城解放了，我们县委和县政府机关搬进了巨野城。后方仍在王水坑和黄塘。在四六年春节党元修同志被暗杀了。事情是这样的，四六年春节前两天（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党元修要到县委（黄塘）去领过年的东西和工资（那时不叫工资，就是几块钱），准备过年。就在这次到县委的前一天，有他本家的两个叔兄弟（一个区武委会主任是地主党暮银的二儿子，另一个是县武委会秘书是党暮君，是党暮银的弟弟）到他家玩时探问他，你还到堤北去吗？他说，现在不去，明天我去县里，和县里同志一起去。又问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今天晚上不回来就明天晚上回来，明天晚上不回来就后天早上回来。由于元修同志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不高，认为他们都是自己的叔兄弟，又是国家干部，就向他俩说了这次到县委的去和回的时间，以致在大年初一早晨，当他一人回家，走到甲庙（那是十八里的洼）时，就在这个洼里遇上这两个人和另一个地主的小儿子（县交通局的交通员）把他截住了，他们三个人先把元修骗到沟里，然后将其杀害了，元修不幸牺牲了。因为出事时是大年初一早上，老百姓不出门，根本没人看见，也没有人听见，打死后就把他扔到路沟里，所以直到午后有人路过时才发现。县委、区委和公安机关得知党元修被暗杀后，立即在群众中进行了调查。开始听一个放羊的人说，他听到放枪后从路沟里出来了三个人，向南走了。为弄清这三个人到底是谁，就到附近村里去查问，有的人说，早上吃饭时看见三个人由北边过来到村边站了一会，其中一个人买了一盒烟，其中还有一个是县武委会秘书党暮君，再就是地主党暮银的二儿子。抓住这个线索去查，但表面上未动，土改的时候，党元修对地主党暮银斗的很认真，地主怀恨在心嘛。一个儿子是我们区武委会主任，一个儿子在家，小儿子还是县交通局交通员。因为党暮君虽是我们县里的干部，但再没别人，所以县委认为党暮君的可能性很大，年过完后，他们都回机关了。回来后，先是任县武委会秘书的党暮君汇报说，党元修被人打死了，是谁杀死元修的不知道。我们先把他们三个人关起来审问，发现党暮君的枪筒内有血，他无法抵赖，承认自己是凶手，并供出他们三人作案的后台是党暮银。查实后枪毙了党暮银和党暮君，二儿子跑了，小儿子只有十八、九岁没枪毙，判了刑。党元修同志被地主暗杀而牺牲，这对当时地方党的建设是个很大的损失。

再把昨天谈的情况补充一下，就是到巨南以后。

巨南工委组织有颜竹林、杨海鹏，还有王擦丽、朱连之，这是巨南工委的组织情况，我记得是这样的。还有巨西县委，当时是王尊先、张自强、张敬梓（县政府武装科长），王绍一、代洪慈（县妇联主任）和杨平（他原名叫姚紫垣）。姚紫垣是巨野北面姚庄人，和王绍一在一块，他的家庭是大户地主，还有一个代洪慈（现在江西九江干休所，匡斌同志的爱人，匡斌原江西军区副司令员，已经去世）。他在巨南时是九团团长，昨天说的杀害党元修同志的凶手，是当地的地主党暮银和其本家兄弟（地主）党暮君，还有党暮银的两个儿子，亲自去杀害党元修同志的是党暮君和党暮银的两个儿子，党暮银没出去，但他是主谋，因为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元修同志对他进行揭发，斗得很凶（元修从小给他干活，受尽他的折磨）。从那以后，他就怀恨在心，他把二儿子都派到我们县、区机关来工作，了解情况，对杀害元修早就有预谋。

原来巨南工委和行政上的五县（金乡、巨野、嘉祥、成武和定陶）联办，实际上在定陶县我们的工作未进去。成武的汶上区，那里的群众基础很差，主要是临近定陶县的一个区的区长叫姬长周，他有一个团经常在成武的汶上区活动。这个团与我们搞统战，我还是争取他。经过我们救灾，发动群众，在这个地区把国民党压出去了，我们的工作展开了，建立了政权，群众组织（工、农、青、妇）也都建立起来了。定陶的国民党县政府，县长我记得是姚崇礼。

大概在四三年底前后，有一个同志来到我们这里，说他是抗大学生，我们问他，你怎么回来的？他说是失掉联系了，到我们这里来接关系。他认识工委组织部长杨海鹏同志，他和杨海鹏同志是同学，他叫王福庭，他来后对我们挺不错。我们也估计他原是在抗大学习的。他来接关系，我们征求工委组织部长杨海鹏同志的意见，杨说与他原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在学校时表现很好，他是定陶冉堦集人。他要求工作，经海鹏同志同意给他安排后，我对他说，你就在定陶吧，直接找我联系，定期汇报，其时间由我安排。他说他和姬长周的儿子是同学，关系很好，我说，那你就到那里去工作。四四年初，他经常来汇报工作，谈姬团的情况，后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建立组织嘛。抗战初至四四年就失掉联系了。在这段时间，这个人的工作还是很好的。我于四四年四月被调到太行山平原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四五年五月回来。四五年初，姬团就起义了，改编为巨野独立团。团长就是姬长周。因为他是个老头了，实际上是他的儿子在管部队。只不过有点名望，实际上他连一点工作也没做，来了就宣布起义。那时我不在家，这个团的政委就是那时任县委书记的丁建乔同志（现在北京信访局当顾问）。有个李君同志任总支书记。这个团起义后就整编了，原建制未动，把我们大队的两个连也编进去了。姬的那个部队原都是一些土匪头头拉起来的，差不多都是这些人组成的。姬长周原本就是地头蛇嘛，都是一伙的。整编后，经过教育，这支部队逐步升级，后到主力部队去了，发了机关枪，到主力部队后还是比较好的。这个部队大概最后还有两个连不愿去主力，其中的一个连在五月份把我们派去的政治指导员打死了；另一个连拉走了，后来战士都回家了，拉出去后就散了。后来这个连长（名字记不清了）被我们抓到后枪毙了。被打死的指导员的名字也记不清了（李君同志知道，现他是贵州国防工办副主任）。我五月份从党校整风回来以后，没有在部队工作，任

县委副书记兼民运部长，在日本投降，平汉战役之后，部队要补充兵员，要动员参军。当时是很不好动员的。为了有利于动员参军，在动员了几批之后，县委决定成立一个新兵团，县里干部、区里干部带头参军。这时他们对我说你担任过县大队政委，你就带个头吧，于是我就带头参军了。成立独立团，有五、六个连。张敬梓（现在天津休息）任团长，那时他是武装科长，我是政委。组成后不久就交给主力部队了。我呢？工委不让我到部队去，留在地方，我只好把部队交给主力后又回到县上任县大队副政委兼副书记。在我离开部队还没有一个月，在打章凤集时（即龙凤之战），因新兵还未训练就参战，造成很大伤亡。有个地方干部到部队当连长，第一次参战就牺牲了。他叫李孝成，这个同志人很老实，工作很积极，冲锋在前，英勇牺牲了，这是我在部队那段时间的情况。

以后主力就过黄河了。巨野成立县大队，我就在县大队工作。四五年十二月卅一日，巨野县城解放，巨野的伪县长曾子南，是个杀人魔王，罪恶很大，他跑了，跑到济宁去了。巨野解放前，大约在二十几号，军区通知我们到城边去。因为正在围攻巨野的我主力部队要了解情况，我们就由巨西到了城边。第二天巨野就解放了，我们进城以后，出安民告示嘛，还建立了城防司令部，王绍一同志是司令（他是县长，我是政委）。在巨野住了二个月，后魏凤楼的起义部队住进巨野城，我们就把部队带到大义集去了。县政府、县委机关就住城里。巨野解放后，国民党的伪军等残渣余孽经常打、抢，扰乱治安，秩序很乱。

四六年上半年，我们到大义集刚安下摊，部队就要整编。毛主席到重庆签了双十协定后，跟国民党讲和平，搞合作。部队也不发展了，人员也不扩大了，实行自然减员，这时我就有个想法，跟蒋介石还能和谈吗？我怀疑。那时我们县大队三个连的建制未动，年轻的愿意当兵的都留下，年老的和病号都走。那时“双十协定”讲和平、讲民主，部队统一规定，跟国民党部队一样，你编几个师，我也编几个师，我们部队全部都是在号的，上边都有名单，你这个人回家比如我张自强回家了，另外来一个人就叫张自强补上去。我们几个连的人数基本保持未变。我在大义集住了不到二个月（大约六、七月份），军分区交给我一个任务，带二个连到济宁去，济宁有个兵工厂，是日本在济宁的一个修械所。为准备应付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要把这个兵工厂由运河迁到黄河北，我们负责运兵工厂的设备，一天运一趟，从济宁运到开河下船（开河在南旺县），还有个银行也往运河北运。前前后后运了大约四个月。我记得银行运的鲁西票用麻袋装着，当然当时谁都不知道是啥东西。这次到济宁，大队副李来进未去，仍住在大义，按说他是军事干部应该他去，但他托病不愿去，所以只有我去了。战争开始他就回家当老百姓了。我在济宁完成任务时济宁已吃西瓜了，回来后我们就没进大义，住在附近农村待命。因为国民党部队已全面进攻了，我二野司令部驻在大义集，准备打仗了。这时，我们正在大义已经安家，开了酒店、百货商店等。现要打仗了怎么办呢？干脆谁能带啥就带啥。

大约在七、八月份，在洋湖战斗打响时，国民党特务武装、封建会道门武装准备接应他们的主子国民党部队，他们四处骚乱，红枪会又起来了，新的战斗又开始了。开始在南旺县（南旺县在巨野的东北角）。声势很大。嘉祥、巨野，甚至连济宁的地主武装

都来了，把南旺地区控制了，他们往巨野方向挤。他们进住到你这个村如果你不跟着他，他就几千人在你这个村里吃喝，所以你只好跟着他。由于我们巨野县委、县府和部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巨野的杆子会未敢动，只少数人参加了几天就又回来了。我部队到巨北去后，以巨北为根据地，主动向南旺县方向挤，南旺县红枪会暴动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时，正是主力部队到定陶的大洋湖围攻国民党暂三师去了，只有我们分区独立营和几个县大队。敌人对我们封锁很严，我们和分区仅隔一个庄就联系不上。与嘉祥、郓城也联系不上，侦察员送信被他们抓去就杀害了。他们离巨野很近，我们不能走，因为王绍一是县长（巨北一区人），我们一离开巨北，他们就会进来，我们决心寸土不让。那又怎么办呢？我十几天都在想这个事，行军、吃饭、睡觉也在想。后来决定以王绍一的名义写了一个通告，就是告群众书。这个通告的主要内容是向群众讲清杆子会是怎么来的，又怎么被敌人利用。指出老百姓跟国民党特务是不会有前途的。还给他们讲，我们当兵是准备打仗的，时刻准备牺牲，胜利属于我们，老百姓跟他们白送命，什么也没有。特别指出他们这次暴动，主要是国民党特务搞的，不要相信他们。这个通告送出去后很起作用，十几个村都交了红缨枪，有的儿女把他们的老头也叫了回来。我们采取这个政治攻势取得很好的效果，凡是通告送到的地方部队都没动，老百姓都主动把红缨枪交了好多来。这个通告是用笔写的，发送到巨野、南旺临近的所有村庄，巨北一区、南旺的孟姑集，国庄等地都送发了。

巨野大队控制了南旺沿巨野边的几个村庄，到村上就开会宣传，势力逐步扩大了，最后把敌人压到了下水口。分区司令部及其独立营都在南旺的东边，因下水口周围都是他们的人，我们和分区联系不上，如果通过他们地区，抓住就会被杀掉，一个也跑不了。他们都是本地人，你不认识他而他都认识你。这样搞了一个月直到大洋湖战斗结束。二野派了打红枪会有经验的57团来了，一开始就把敌人压到下水口村去了，把东、西、北门堵得死死的，留南门让敌人突围跑，我们在南门外一里路地的路两边架起轻机枪，打埋伏。主力部队冲进村，上房用手榴弹打，敌人向南门逃出后即进入我们的埋伏区，遭到轻机枪的猛烈扫射，死的多是国民党特务、地主武装头子和反动会道门死硬派等这些顽固家伙。我们在外围和分区联系上了，敌人来一个我们抓一个，也有的敌人很顽固，不管怎么问他不讲，报以“爱杀就杀”的抵抗态度。有的战士就打，他也不讲，死心踏地。我制止战士不要打俘虏，“不要打了，抓了很多都放了”。一说要放他，他说：“以后不再干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政策，以为被抓住就活不了，很多从村里逃出来被我们抓住的就没有杀。

巨野情况有好转不久，国民党全面进攻，占领了济宁。打洋湖战斗结束不多久，下了几天雨，冒雨行军，路不好走，一路泥泞，一晚要移住好几个地方，以防杆子会突然袭击（包围）。杆子会的人连亲戚都是不认的，这样一个多月来都没有休息好，打完杆子会该好好休息了吧！可是我的痔疮复发了，到黄河北医院做了手术，这是46年9、10月份的事。我走了后，县大队去了个谢忠信副政委接替我的工作。我开始去河北（黄河还没有放水），住在寿章祝口，就是三打祝家庄那个地方，以后叫祝口。三月份刘邓部队在河北休整完之后南下。刘邓过黄河以后，在郓城消灭了敌55师，七月份在巨

野的六营集把国民党32师和70师包围了。这时，我的病好了，出院后到分区，分区让我留在分区到独立营去。我说行。一切都准备好了，巨野县委都来信叫我赶快回县，敌人的三个师（32师、70师、66师）住到六树营，压到金乡、巨野、嘉祥交界的地方。打了冉堎集以后，二野往北去。巨野县委向分区反映，叫我回县，开始分区不同意，要我留部队，但地委不同意我留部队。后来，分区只好同意我回巨野。回来后把部队整顿了一下，这时正好二野的部队消灭了那三个整编师，刚撤出战斗，羊山集的66师还未歼灭，我们就去打扫战场，敌人的许多伤员和尸体都摆在村内，武器、弹药到处都有（如手榴弹、机枪、掷榴弹、六〇炮，有的还未见过）。我们就把几个区中队合并了，编为四个连，一个连就配备了缴获的九挺轻机枪，比野战军的装备还好。羊山战斗结束后，二野还未休息就奉令南下，那天晚上，分区、地委召开紧急会，把我们找去了，在会上讲：“刘邓南下是战略上的进攻，大家不要怕，二野南下还有部队接防。目前有敌人的36个旅的兵力由黄河边向南压来了。二野南下，今晚行动要过铁路，要到大别山。”动员我们立即行动。会后立即准备，因为时间很紧，敌人已到巨北离我们很近，当晚我们就要行动。那时候跟随二野南下的两广纵队（原琼崖纵队）的纵队司令员曾生开始过黄河就和我们联系上了，由于他对情况不了解，他对我说：“你要给我派一个连带路。”我说“行嘛”。我把四连交给了他。刚走了，分区开会就讲：“二野南下，做好准备，现在的形势是沿黄河边的敌人，从东西两边压过来，准备和二野决战，敌人36个旅，由北向南压过来，你们坚持地区，坚持地方，二野南下还有部队。”会后，我们回来了。那时分区没有部队。部队“升级”走了，分区司令员张刚剑（现南充分区司令员，已离休）对我说：“我们往敌人后边插，敌人南下，我们就往北去，你们大队跟我走，分区没有部队就由你们大队保卫分区机关，听我指挥。”我说：“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接受了任务。刘邓是那天晚上出发南下走的，这天雨下得很大，大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从头天黄昏一直下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黄昏时出发，因敌人走大路（地的两边是大路），两边都有敌人，我们不走大路，全都走地里。我们走洼地，因下大雨，虽然行军的声音较大，但两边路上的敌人也听不见。同样敌人走路声我们也听不见。通过嘉祥、巨野公路时，冒着倾盆大雨整整走了一夜，才走了二十几里路，部队前边找不着后边，后边找不着前面。走到嘉巨公路以南才进一个村庄（什么庄忘了），和分区失掉了联系，这时正是半夜雨下的很大，在大雨中召开了一个区长区委书记参加的干部会，区、区委、民兵千人跟着我，目标大，行动、指挥都不方便。开会就是说明这样对部队行军有影响，人太多，遇到敌人不好办。要各个区长带各区的人分散，区长们说，这样行，分散也好。会后，他们各自回去行动了。我带县大队和县委、县政府人员又北上了。我们到了嘉巨公路时天快明了，不下雨了，遍地是水，有的水深至腰，加上天黑，村找不着村，路也看不见路，有的掉在井里，有的掉在坑里。这样我们摸着黑继续杵着杆子摸着前进。早饭时间后，到了巨北佃户屯。佃户屯人说，敌人是半夜走的。因情况不了解，大义区长刘德炳同志带着他区的人到阴柳棵里藏起来正好遇上了敌人后边拉着给养的车，当兵的打着牛，因拉不动到阴柳棵里搞阴柳来打牛，他们就在敌人的前面也没有被发现，但他们把枪对准了敌人，随时准备战斗。敌人全过完了，大队到了巨北。到处是水，在那一两个月中，巨野临近的几个县